

· 国外中共党史资料 ·

奥地利国家档案馆馆藏涉华档案评介*

黄肖昱

1938 年至 1945 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沦为纳粹德国的东部边区（Ostmark）。二战结束，出于对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美英法苏四国对奥地利实行分区占领，直至 1955 年签订《国家条约》，四国撤军，奥地利才真正重获独立。冷战时期，奥地利在美苏两个大国的博弈下变成一个中立国。加之地处东西方交汇地带，奥地利成为二战后大国进行外交谈判和情报交换之地，同时也是各大国际组织的常驻地。

2021 年，奥地利社会各界同我国驻奥使馆为庆祝中奥建交 50 周年举办了多场活动，从不同层面回顾了两国的友好关系史^①。关于 1949 年以来的中奥关系史，国外已有学者有意识地利用奥地利国家档案馆馆藏外交档案开展研究，但迄今国内尚无专门的论著问世，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国内学者对该选题原始史料的分布缺乏了解^②。鉴于此，本文在介绍奥地利国家档案馆馆藏概况和查阅流程的基础上，举要分析该馆共和国档案分馆所藏 1949 年以来涉华档案及其史料价值，为深化中奥关系史等研究提供更多的线索和思路。

一、馆藏概况与档案查阅

奥地利国家档案馆位于首都维也纳，收藏有奥地利自巴本堡王朝、哈布斯堡王朝、第一共和国和第二共和国以来的档案史料，由王室、宫廷和国家档案分馆（Haus-, Hof- und Staatsarchiv）、公共管理档案分馆（Allgemeines Verwaltungsarchiv）、财政与宫廷领地档案分馆（Finanz- und Hofkammerarchiv）、战争档案分馆（Kriegsarchiv）、共和国档案分馆（Archiv der Republik）和一个图书馆组成。

王室、宫廷和国家档案分馆，前身是 1749 年奥地利女王玛丽亚·特蕾西亚创建的哈布斯堡王室中央档案馆，主要收藏哈布斯堡帝国时期的宫廷和内阁手稿、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司法档案以及奥匈帝国时期的外交文献等史料。

公共管理档案分馆，收藏有哈布斯堡帝国 1550 年至 1918 年的内政、司法、经济和农业史料，以及帝国时期身世显赫的大贵族及其家族档案。

财政与宫廷领地档案分馆，由财政档案馆和宫廷领地档案馆组合而成，收藏有哈布斯堡帝国时期的交通、矿产、建筑和贸易等档案文献。

战争档案分馆，是中欧地区馆藏最丰富的战争档案馆，源自 1711 年创建的王室战争档案馆和 1801 年卡尔大公创建的军事研究所，收藏有 1740 年至 1918 年哈布斯堡帝国时期的士兵、军官个人档案，19 世纪至 20 世纪的奥地利海军和空军档案，16 世纪至 1882 年哈布斯堡帝国军事行动部署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外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史料整理与研究”（21&ZD243）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 <http://www.50-years-of-chn-aut-relations.com/cn/pc/index.html>。

② 参见 Graf, M and Mueller, W. *Austria and China, 1949-1989: a Slow Rapprochement*. Schaufelbuehl, Wyss, Zanier edit. (2019) *Europe and China in the Cold War, Exchanges Beyond the Bloc Logic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Leiden Brill. pp.19-40.

以及一战期间奥匈帝国军队部署等军事档案。

共和国档案分馆，收藏有自1918年奥地利联邦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档案文献，包括第一共和国时期、纳粹时期和第二共和国时期内阁、外交、司法、交通和商贸等史料，是研究奥地利现当代史的学者们经常光顾的重要学术机构^①。

奥地利国家档案馆隶属于总理府。其中王室、宫廷和国家档案分馆位置较为特殊，位于维也纳内城区（第1区）的方济住院会广场1号（Minoritenplatz 1, 1010），靠近霍夫堡皇宫，与总理府共享同一建筑群。档案馆开放时间为星期一到星期三的9点至16点、星期四的9点至18点，星期五以及奥地利法定节假日闭馆。另外4个分馆均位于维也纳第3区的诺腾多夫大街2号（Nottendorfergasse 2, 1030），是一座1986年投入使用的新式建筑。开放时间为星期一和星期四的9点至17点、星期二和星期三的9点至18点，星期五以及奥地利法定节假日闭馆。

在奥地利国家档案馆查阅档案，需要缴纳一定费用办理年卡或次卡。首次查阅者在缴纳费用后，还需要凭借护照或其他有效证件前往咨询台向档案咨询员告知国籍、住址、单位、研究方向、合作导师等个人信息，待生成查档单后才能进入阅览室。如果对档案分布信息不了解，可以随时向档案咨询员寻求帮助。档案咨询员多为博士毕业，具有良好的英语和德语沟通能力。如果他们也不熟悉相关档案的分布情况，则会联系分馆的负责人，由负责人亲自答疑解惑。目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查档的学者还需要提前在网站预约。

1949年以来的涉华档案、特别是中奥关系史相关档案，多收藏在共和国档案分馆。该馆所藏档案一般按照年代（Jahre）、档案盒（Karton）、国别（Land）、事件（Betreff）进行简单的分类，其中1946年至1972年外交档案的事件分类均以数字编号代替。编号所代表的内容分别为：1——政府首脑、国家元首，2——外交，3——内政，4——教会，5——军备，6——媒体（新闻、广播出版物），7——个人，8——财政、赔偿，9——边境，10——少数民族，11——难民，12——国会，13——归还，14——社团及协会，15——撤军，16——和平协定，17——资产，18——外债、资产、债券，21——奥地利代表，23——体育，24——演讲，25——工会，49——其他。对于这部分档案，我们很难通过目录判断档案的具体数量和内容。比如，“1957年，第423档案盒，中国2、3、6、49”，只能大致推测1957年的涉华材料与外交、内政、媒体有关。关于中国的卷宗，甚至经常和智利、塞浦路斯、哥斯达黎加、丹麦、德国等国别德语首字母为C或D的国家放在同一个档案盒里，给查阅者造成一定的困扰。

而1973年至1975年的档案目录，馆方更细致地标注了标题和国别，方便查阅者更加准确地查找所需史料。1976年至1991年的档案，馆方尚未制作目录，如果需要查阅，必须在动身前往档案馆前与馆方沟通，尽可能详细地告知自己研究所需的文献信息，由他们去库房查找、调取^②。

值得注意的是，从档案馆网站上搜索的涉华档案卷宗是不全面的，若想查询更加详细且准确的档案，还是需要到馆内翻阅馆藏目录索引^③。

二、涉华档案举要

当前奥地利国际关系史的研究重点，多是奥地利与美苏大国的外交关系，或是奥地利关于南蒂

① 关于奥地利国家档案馆各分馆的馆藏介绍，参见 <https://www.oesta.gv.at/fuehrungen-im-staatsarchiv>。

② 根据30年解密原则，目前奥地利国家档案馆只能开放1992年以前的档案。

③ 奥地利国家档案馆检索系统：<http://www.archivinformationssystem.at/suchinfo.aspx>。

罗尔、巴尔干和中东事务的外交决策等^①。即使在维也纳大学的历史系和汉学系，也没有多少学者涉足当代中奥关系史研究。奥地利虽地处中欧，但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接近。因此，梳理中奥关系史档案可以为新中国同西欧国家关系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案例。限于篇幅，笔者在此只选取部分档案作简要评介。

关于中奥建交前的双方接触。馆藏 1948 年至 1950 年的档案（档案盒 98、99、134），主要是奥地利驻华公使馆同奥地利外交部的往来电报。时任奥地利驻华公使史登福（Felix Stummvoll）多次向奥地利外交部汇报国共战场局势、中共领导人履历以及解放军占领南京后针对各国驻华外交官的活动等。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史登福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大势已去，中共即将统一全国，成为这个国家新的领导者，建议奥地利为维护其在华利益，应向英国、瑞士学习，尽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新生政权。但当时正在战后重建且接受美国“马歇尔计划”援助的奥地利，对此一直持谨慎的观望态度。外交部部长格鲁伯（Gruber）在回信中担心与新中国建交会得罪美国，“希望等美英法苏四大占领国陆续承认新中国后，再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②由此可知，在中国政权鼎革之际，奥地利对中共所领导的新中国并无太多实质性的接触。

美苏两国在奥地利实现国家正常化道路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尽管奥地利 1955 年重获独立，但能否与新中国建交，还是要受到美苏两国的掣肘。1971 年中奥建交前，奥地利同中国的联系基本上是通过商贸合作这种非官方途径实现的。

1956 年的维也纳秋季博览会在中奥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二战后中国代表团第一次正式出访奥地利。馆藏 1956 年“中方参加维也纳秋季博览会”的卷宗，包含中奥两国就参展形式、展出内容、中方在维也纳日程安排等问题进行磋商的 10 多份档案。根据奥地利外交部的电文可知，奥地利外交部对中国即将参加 1956 年维也纳秋季博览会一事十分重视。就参展形式而言，奥方认为，中奥之间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中方参展代表团只能以企业的名义参加展览；就参展产品而言，中方的展出品只能标识为企业而非国家。奥方此举是为了尽力避免再次发生联邦德国驻奥大使就秋季博览会出现民主德国展馆而向奥方外交部交涉的类似事件^③。

于是，中方代表团决定以中国贸易促进会和华润公司的名义参加维也纳博览会。实际上，贸易促进会的代表团已经在同年早些时候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博览会，中国以贸易促进会的名义在巴黎的顺利参展为参加维也纳秋季博览会起到了预热作用。中国贸易促进会向奥地利驻法国使馆提交了参加维也纳秋季博览会的 14 人入境名单，就入境签证事宜同奥外交部进行交涉^④。

奥地利方面，该国工业联合会主席马里奥·马尔奎特博士（Dr. Mario Marquet）亲赴维也纳布里斯托尔酒店，同参加维也纳秋季博览会的中方人员接洽。会谈记录显示，奥方在会谈时才知道，中方代表团的秘书长，并非奥方工业联合会驻英国和香港的外贸代表所告知的香港华润公司总经理张平。此时的张平正在荷兰和比利时访问，将于秋季博览会开幕前抵达维也纳^⑤。奥方还得知中方计划的展品有 1400 件，主要是能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发展水平的工业产品。马尔奎特博士在会谈

① 关于二战后奥地利外交政策史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参见 Cede, F and Prosl, C. (2015) *Anspruch und Wirklichkeit: Österreichs Außenpolitik seit 1945*. Innsbruck: StudienVerlag.

② *Anerkennung Sowjet-chinas*, Vienna. 31.1.1950. Gr. Zl. 120.203. ÖStA, AdR, BKA/AA, II-Pol 1950, China.

③ *Teilnahme rotchinesischer Aussteller an der Wiener Herbstmesse*. 22. 6. 1956. GZ. 515851. ÖStA, AdR, BKAA, I-Pol 1956, Österreich.

④ *Teilnahme rotchinesischer Aussteller an der Wiener Herbstmesse*. 21. 6. 1956. GZ. 515851. ÖStA, AdR, BKAA, I-Pol 1956, Österreich.

⑤ *Teilnahme rotchinesischer Aussteller an der Wiener Herbstmesse*. 18.7.1956. GZ.56147 ÖStA, AdR, BKAA, .Wpol, 1956, Ausstellungen.

中表示“中奥双方接触的时间节点十分合适，目前在北京访问的奥方商会代表团同中方的谈判取得了积极成果，他们返奥后毫无疑问会对中奥之间的联系产生积极的影响。”^①

中方代表团顺利参加维也纳秋季博览会，实践了“以民促官”的人民外交路线，促进了中奥乃至中欧之间的相互了解，逐步打破美苏等国对新中国的遏制和封锁。1964年奥地利联邦商会同中国贸易促进会签署《促进两国经济发展协定》等三项协定，是继中法建交后中国与西欧关系的又一重要突破^②。

此后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奥之间的交往出现了停滞，但奥地利仍然通过各种途径关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外交政策。以1969年的档案盒为例，包含“中共九大后的外交政策”“部分西方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美华沙大使级谈判取消”等卷宗。这些档案记录了奥地利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的研判过程。例如，奥地利驻香港领事馆详细分析了中国与加拿大、比利时和意大利的建交谈判过程，总结了未来奥方同中国建交需要注意的三个问题。一是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决策会时常发生变化，这使得中国政局不够稳定，但台湾国民党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反攻”大陆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二是新中国的外贸关系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小，经贸与政治的关系相对疏离；三是同中国建立经贸关系并非能持续从中获利。最后，奥地利驻香港领事馆认为，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符合奥地利的国际利益，加拿大同中国的建交谈判可以作为未来中奥建交的模板。^③这些前期的外交情报研判，为中奥双方在1971年5月28日较为顺利地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关于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奥建交不到半年，新中国就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1年的档案盒收藏了大量奥方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的相关卷宗，如“奥地利外长在联合国就中国问题表态”“中国对重返联合国的反应”“联合国对中国的态度”“奥地利对‘两个中国’的态度”等。奥地利对这一问题的关心有其自身的原因，1971年奥地利前外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将竞选联合国秘书长一职。时任奥地利外交部外交事务秘书长的沃达克(Wodak)在发回国内的电文中表示“在同苏联讨论接替吴丹的下一任人选时，我们是否能得到对瓦尔德海姆参选的支持，中国对此问题的态度就显得意义重大了。”^④

奥地利长期在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上投弃权票，中奥建交之际改投赞成票。就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奥方外交部认为，就经济而言，由1964年至1970年奥地利对华贸易进出口额可以判断，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活力，而奥地利联邦商会赴中国考察反馈情况则证明中国经济仍然有增长的空间；就文化而言，法国和荷兰等国的行动表明，西方国家同中国已经形成了紧密的文化交流关系。奥地利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才是对新中国负有“道义责任”(moralische Verpflichtung)的最好表现形式。^⑤

此外，时任奥地利外交部部长的鲁道夫·基希施莱格(Rudolf Kirchschläger)还表示，中奥建交是奥地利对国际政治形势作了评估后，在合适的时间作出的正确决定。所以，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遵循中奥建交公报的“一个中国”原则，同样符合奥地利的利益，是奥地利奉

① Teilnahme rotchinesischer Aussteller an der Wiener Herbstmesse.18.7.1956.GZ.56147.ÖStA, AdR, BKAA.Wpol, 1956, Ausstellungen.

②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405页。

③ Frage der Anerkennung Pekings; chinesisch-kanadische Beziehungen; kuenftige oesterreichische Haltung.24.3.1969.GZ.19693, ÖStA, AdR, BMAA, II-Pol 1969, VR China.

④ Wodak, China Abstimmung bei den VN; Bestellung des neuen Generalsekretärs.2.11.1971.ÖStA, AdR, BMAA, II-Pol 1971, VR China.

⑤ Österreich Verhältnis zu den beiden China, Analyse.8.1971.GZ.117.484-6, ÖStA, AdR, BMAA, II-Pol 1971, VR China.

行中立外交政策的体现。另外，他还根据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宣布第二年访华等情况判断，世界形势将会发生变化。^①

关于中奥建交后的两国交往。1971年5月中奥建交后，两国高层交往日益密切，就国际形势等问题进行过多次会晤。例如，1973年和1974年的卷宗中包含“中奥驻日大使会谈”“莱特纳(Leitner)大使同董必武就欧安会问题举行会谈”“李先念同奥地利联邦商会代表会谈”“国会议员菲舍尔访华”等多份档案。

1973年，奥地利第二任驻华大使莱特纳上任伊始，便同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就欧洲安全理事会、国家中立等问题进行讨论。莱特纳表示，所谓的欧安会不过是苏联的一个骗局，苏联无法通过欧安会实现对欧洲边界的调整。比如联邦德国只关心其同民主德国的边界，不关心与他国的边界。亚洲情况同样如此，中苏两国一年多的边境谈判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关于和平与中立问题，莱特纳从奥地利以及欧洲近百年的历史谈起，认为国家中立在战争期间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如同希特勒手握重兵时根本不会考虑他国是否保持中立。^②

1974年3月，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访的奥地利联邦商会主席赛林格(Sallinger)一行。奥方有意回避中方提及的两德问题，主动将话题引到超越国家的欧洲一体化经贸合作上。当中方询问奥方如何理解华约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一事时，奥方再次沉默，不作回答。^③9月，初次访华的奥地利国会议员、社民党人海因茨·菲舍尔(Heinz Fischer)，同时任中国外交学会副会长的柯柏年举行会谈。奥方询问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何行使权力，中方就中国的人大制度与欧洲议会制度的异同作了简要说明，并提及美国在欧洲的驻军话题，奥方对此无明确回应。^④

中奥双方的谈话记录表明，中国关心奥地利的国际中立问题，并借此话题阐释中国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看法，意在向西方世界传达反对霸权主义、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世界多极化发展的外交理念。碍于中立原则，奥地利并未就苏联或美国问题作过多的明确表态。

此外，该档案馆还收藏有涉及中奥两国文化交流的档案。例如，1974年2月至4月在维也纳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⑤，同年3月在北京举办的奥地利工业展览^⑥。中奥两国的文化交流凸显双方在冷战格局下，不断以文化外交、公共外交的方式展示和塑造国家形象，促进了中奥乃至中欧之间的交流正常化。

通过对奥方档案的梳理可知，重获独立的奥地利，为了扩大国际影响力和发展经贸等需求，一直通过多种途径关注新中国的外交决策。同样，强调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新中国，也希望借助奥地利特殊的地缘优势，发展和平友好的合作关系，逐步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实现与欧洲的正常化交往。

① Bericht des Bundesministers fuer Ausw. Angelegenheiten ueber die Haltung Oesterreichs in der China-Frage.30.11.1971.ZI.121.101-6.ÖStA, AdR, BMAA, II-Pol 1971, VR China.

② Gespraech zwischen dem amtierenden Vorsitzende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Tung Pi-Wu mit Botschafter Dr. Leitner am 23. April 1973 in der grossen Volkshalle anlaesslich der Ueberreichung des Beglaubigungsschreibens.14.5.1973.ZI.16 II-pol 1973, VR China.

③ Österreichische Industrieausstellung in Peking-Österreichischen Regierungdelegation unter Leitung von Praesident R.Sallinger durch den stellvertretenden Ministerpraesidente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Li Hsien Nien.ÖStA, AdR, BMAA, II-Pol 1974, VR China.

④ Protokoll ueber das Gespraech zwischen Abgeordneter zum Nationalrat Dr.Heinz Fischer und dem Vizepraesidenten des Institutes des chinesischen Volkes fuer auswaertige Beziehung KO Po-nien am 26.September 1974.ÖStA, AdR, BMAA, II-Pol 1974, VR.China.海因茨·菲舍尔自2004年至2016年担任奥地利联邦共和国总统，现任奥中友好协会主席。

⑤ China Ausstellung inWien.ÖStA, AdR, BMAA, II-Pol 1974, VR China.

⑥ Österreichische Industrieausstellung in Peking, ÖStA, AdR, BMAA, II-Pol 1974, VR China.

三、涉华档案的学术价值

重视并利用奥地利国家档案馆馆藏 1949 年以来涉华档案，开展中奥关系史研究，尝试探寻中奥、中欧之间交往互动的结构性因素，对于理解新中国的欧洲外交决策，拓展外交史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有助于丰富新中国对欧洲国家外交决策的认识。毛泽东曾提出“两个中间地带”“三个世界”和“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理论，即争取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和欧洲发达国家，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倡导世界多极化发展。冷战时期的奥地利 1955 年宣布永久中立，却始终笼罩在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阴影下。中奥双方虽然存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奥地利是新中国可以争取和利用的“第二中间地带”。奥方档案详细披露了冷战时期中奥关系从最初经贸关系的互动到外交层面的建交，再到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合作的整体脉络。实际上，同中法建交、中加关系改善、中意互派商务代表一样，中奥关系的发展是新中国打破资本主义阵营的封锁与禁运，突破美苏遏制的外交孤立局面，进入西方世界大门的重要一环。

其次，有助于扩大外交史研究的视野。以往国际关系史书写多注重探讨危机冲突下的大国决策，忽视边缘地带的自主性。奥方档案显示，中奥关系的发展，受到中苏分裂、中法建交、“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加关系推进等国际形势影响。但奥地利出于自身需求不断尝试同中方进行各种形式的接触，这也让处于孤立外交地位的新中国在奥地利成功实践了“外贸先行，以民促官”的人民外交路线。中国贸易促进会和华润公司参加维也纳秋季博览会、维也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北京的奥地利工业展览等中奥之间文化交流的档案，可以让学者从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多角度切入，书写多层次、多维度的中奥、中欧关系史。

最后，有助于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系史研究。当前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合作伙伴中就有多个中东欧国家，地缘因素较为复杂。从地缘政治视角看，作为中立国的奥地利可以起到辐射东西欧的支点作用。虽然冷战时期的奥地利在意识形态上从属于西欧，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和如今的全球化时代，奥地利一直是中东欧的核心地带。因此，奥方涉华档案内容包含但不局限于中奥关系史，其中还有很多涉及中国与国际组织、中国与西方国家、中国与中东欧地区以及巴尔干地区国家交往的史料。通过对这些档案的研读，探究中东欧国家对华交往的心态和行为，分析其在国际交往中的自主能动性和文化独特性，对中国特色外交的推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乔 君)